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項 研究動機

至 2003 年為止，與中華民國保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共有 27 個。¹ 同時中華民國與 150 餘個無邦交國家維持不同程度的貿易、文化與技術合作關係，並在其中 61 個國家設立共 95 個代表處與辦事處，其中日本雖已與中華民國無邦交，但實質關係持續增加。在經濟上歷年來日本為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第 1、2 大夥伴，2003 年台日雙邊貿易額達 445.4 億美元，其中中華民國對日輸出 119.1 億美元，輸入 326.3 億美元，對日貿易逆差達 207.2 億美元。² 甚至從歷史文化、地緣關係、全球戰略上來看，台日兩國應為兄弟之邦，孫中山先生也曾昭示「日本與中國之關係，實為存亡安危兩相關連者。無日本即無中國，無中國即無日本」的想法。中華民國常願與日本維持和平友好關係。但 1972 年日本與中共建交，結束了與中華民國的邦交關係。可是，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中華民國的重要性也提升，導致日本再度擺盪在「兩個中國」之間。

從日本中斷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而與北京建交，此一轉變，必須更加了解日本之外交政策的決定因素。日本的外交決策之內部因素有國內派閥與委員會、在野黨、經濟團體、媒體、還有領導人的特質、官僚機構等。外部因素中最重要的是美國。除了這兩點之外，日本人的民族性與文化也是決定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

¹ 至 2003 年年底為止。

² 經濟部統計資料

http://cus.trade.gov.tw/cgi-bin/pbisa60.dll/customs/uo_o_roc/of_o_fsr12_report?

本文希望透過分析 1945 年至 1972 年之日本的中華民國政策，藉以探討日本與中華民國有邦交的同時，考慮與中共建立邦交的「兩個中國」政策構想，從中更加了解現在的日本與中華民國的關係。

所謂「兩個中國」政策是從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中華民國政府遷移台灣開始的。北京政府與台北政府各主張自己是唯一的中國政府，形成了「兩個中國」並存的狀態。為了解決「中國問題」國際上有人企圖以「共存」方式解決，因而產生了「一中一台」、「兩個中國」的構想。

日本外務省在 2002 年 12 月 24 日公佈 1950、60 年代為主的外交檔案。此檔案³顯示 1960 年代初，日本與中華民國維持良好的邦交關係的同時，已在「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外交路線摸索。1961 年 3 月係由當時日本外務省美國局參事官所擬定的「日本的中國政策」為題的文件指出，中國政策的長期目標是「為了力圖日本國際環境的安定化」，揭示與中台均有邦交關係的概念，但是因為台海兩岸均否定對方政府的存在，因此在表面進行「兩個中國」之活動相當困難，所以將此項外交對策定位為「沈默的外交」，具體的戰略是與中國擴大人員的交流，看情勢與中國簽定政府間貿易協定等，事實上等於是累積承認中國的關係。另外在 1998 年公布的檔案顯示池田勇人於 1961 年訪美時，曾向甘迺迪總統建議讓中共加入聯合國，但遭到甘迺迪總統的消極回應。⁴ 這些檔案顯示，雖 1952 年選擇了中華民國為邦交的對象，但 1960 年代日本池田內閣就開始想接近中國，即擬承認中國、締盟，並思考中台都留在聯合國，而暗中摸索國民黨政府與中共兩岸並存的問題。

此外，此次公開的檔案中顯示佐藤內閣也有同樣的傾向。檔案顯示，因 1964 年 10 月中共進行首次原子彈實驗，日本急於在詹森總統與佐藤首相的日美首相

³ 日本外交檔案，A'-0423 No.37-40「日本の中国政策」，1961 年 3 月 17 日。

⁴ 每日新聞（日本），2002 年 12 月 24 日，1 版。

會談上調整對中國政策。在 1965 年 1 月的日美首腦會談前日方向美方提出，「基於遠東的安全保障，應由『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路線解決」。日本想透過轉換先前的台灣代表「一個中國」的政府方針，同時承認中共來緩和核子彈的威脅。但在日美首腦會談上，詹森總統保證美國一定會保護日本的安全，並強調美國不會放棄台灣，對日本有意承認中共表示否定的看法。⁵

即使日本的承認中共、採用「兩個中國」路線的構想一直被美國否定，但是從歷史事實與此次公佈的檔案等可以知道，日本政府在 1950 年代早期開始就已在「一中一台」、「兩個中國」外交路線摸索。⁶ 雖實際上日本在 1972 年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並與台灣斷交。但是「這段歷程仍顯示了今日之日本外交的現實，相較四十年前之日本，日本還是仍然擺盪於中國與台灣之間。」⁷ 日本在冷戰結束後的現在也沒有改變。九十年代以後隨著中共的經濟力的提升，中共在東亞的崛起，引起了美、日及亞太周邊國家的戒心。為防止中共向西太平洋擴張的意圖，藉日美新安保宣言架構，承諾對台灣的安全。同時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台灣具有高度的戰略價值，如果台灣被中共所併吞，會變成對日本更直接的威脅。

因此，日本雖然已在 1972 年與中共建交，但是還是沒有跟台灣完全斷絕政經上的關係。在中國政策上繼續進行模糊化的「兩個中國」政策，此成為其對台灣政策的重點。

雖然已有許多相關日華關係之研究，但很少是從日本外交檔案來分析日本的台灣政策與「兩個中國」政策。本文擬從日本外交檔案之整理分析入手，據信這亦是值得努力的學術研究課題。

⁵ 朝日新聞（日本），2002 年 12 月 24 日，12 版。

⁶ 參見本文第二、三章。

⁷ 引用池井優之發言。讀賣新聞（日本），2002 年 12 月 24 日，13 版。

第二項 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首先從戰後日本各內閣時期的政策中，探討日本之台灣政策的發展。希望了解從戰後至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之間，日本對台灣採取甚麼樣的政策及各內閣的對台政策有如何的改變。第二是探討日本的台灣政策中「兩個中國」政策之形成背景及原因。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移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形成「兩個中國」並存的現象。使日本企圖與「兩個中國」同時建立良好關係。本文希望能了解何種原因及歷史背景使日本的「兩個中國」構想形成。第三個研究目的就是分析日本「兩個中國」政策失敗之原因。日本曾試探「兩個中國」的形成，但是從1972年與中華民國斷交，與中共建交的歷史事實來看，日本的「兩個中國」構想，始終沒有成功，那麼失敗的原因何在？這也是本文希望透過日本的台灣政策及「兩個中國」政策的研究加以了解。第四是從各時期之「兩個中國」政策的轉變與發展，探討其是否有一貫性。從195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建交到1972年的斷交，日本經歷7位首相，每位首相及內閣都有其重要施政目標及構想，形成不同的決策內容。因此，本文試圖研究各內閣的台灣政策及「兩個中國」政策的轉變與發展，探討不同時期歷任內閣之「兩個中國」政策是否有一貫性。

第二節 研究方法、架構與範圍

第一項 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的應用，本文所採取的是「非實驗性的方法」(non-experimental method) 中的文獻分析法(literature survey)，文獻資料的來源可分三大類：一是蒐集近年來相關日本外交政策研究之書籍等資料；二是正式的官方文件，如政府相關出版品及目前已公開之外交檔案等；三是發表於媒體或學術刊物的文章或論述（如期刊、學術論文、博碩士論文、報紙）；四是當事者的回憶錄（當時首相、外相之回憶錄）。

第二項 研究途徑

（一）歷史研究途徑

歷史研究途徑主要是利用歷史資料來敘述和分析歷史事件之來龍去脈，並解釋整個事件的前後因果關係，加以證明。其目的是想從對歷史事實的敘述，發掘出某一特定時空發生的事實，有何前因和後果，試圖從個別歷史事實的因果關連，去重建過去現象的一種工作。⁸

（二）領導者研究途徑

領導者研究途徑主要是偏重於政治領導人物方面，其研究主旨是認為政治發展的策略進程，除了結構與文化因素外，最主要的決定因素是領導者本人及其領導作風。⁹

⁸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1984年，頁98。

⁹ 陳鴻瑜，政治發展理論，台北：桂冠圖書，1992年，頁65-67。

第三項 研究架構

本文旨在探討日本戰後以來的 台灣政策之變遷。以各時期內閣為分界。並分析各屆內閣對「兩個中國」之看法。擬以六個章節進行論述，各章節之研究架構分述如下：

第一章 緒論：主要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架

構、研究範圍、文獻回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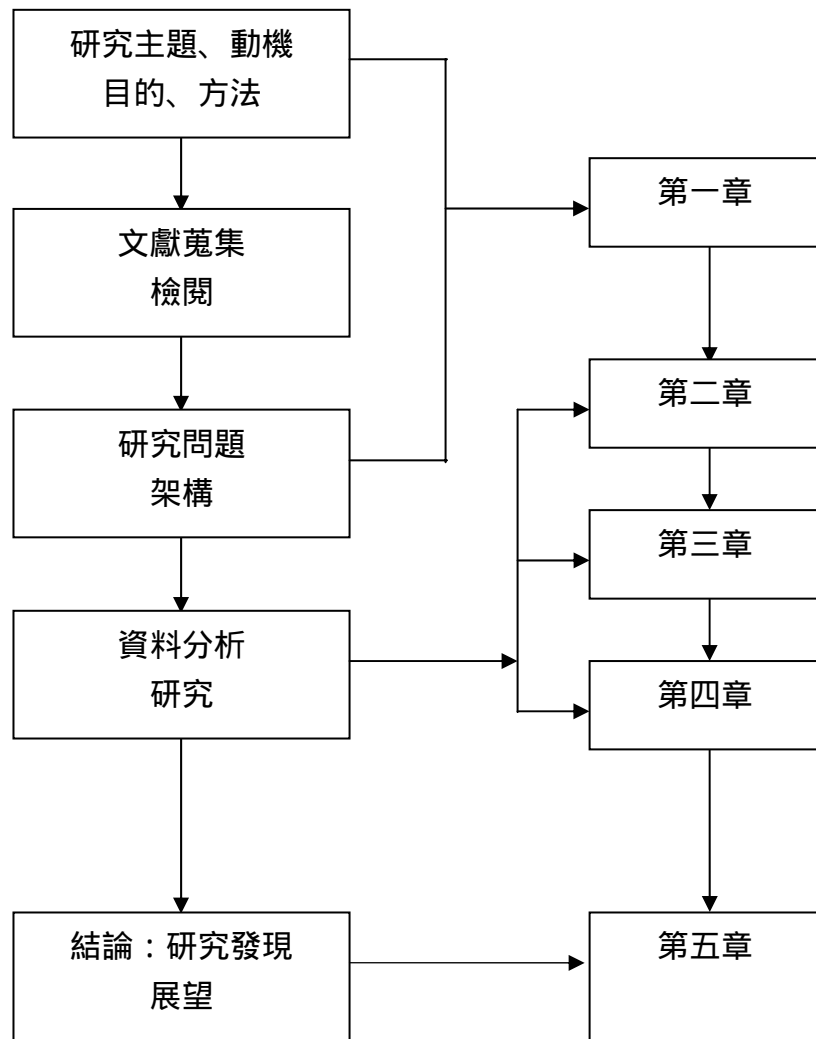
第二章 1945 年至 1952 年之日台關係：本章敘述戰後到簽訂中日和約之間的日本與中華民國、中共之關係。並分析舊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時日本對台之看法。

第三章 1950 年至 1960 年日本之台灣政策：主要從日本的「兩個中國」構想探討日本的台灣政策。從吉田茂開始到鳩山、岸內閣之中國政策及對「兩個中國」之想法。

第四章 1960 年代至 1972 年日台斷交之間的台灣政策：說明池田內閣及佐藤內閣的灣政策及其中關於「兩個中國」政策的內容。說明田中內閣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及與台灣斷交的過程。

第五章 結論：針對以上各章節的研究總結，並與當時的美國之「兩國中國」政策分析比較。

綜合上述本論文之研究架構如下：



第四項 研究範圍

本文研究範圍的重心將放在 1952 年至 1972 年的日本之台灣政策，特別是台灣政策中「兩個中國」政策的部分。在時間上，因歷史之延續性，所以將會從 1945 年日本戰後提起。

為便於說明，本文將以中國和台灣分別稱呼北京和台北，儘量以地理名詞稱呼兩地政府。必要時會以國名全稱稱呼兩地。

第三節 相關研究文獻回顧

本論文資料的取材，主要使用與主題相關的中、日文書籍與期刊論文，以及日本外務省公布的官方檔案等。

其中最重要的一級資料就是近年外務省所公開的有關日華關係的機密檔案。日本外務省從 1976 年開始公開外交文件，如今已是第 17 次公開。公開文書已累積到 11397 冊。這些檔案可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以微卷的方式閱覽。本文所探討之日本「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等議題乃是源自於 2002 年 12 月 24 日第 17 次公開的外交文件之揭示。其中有 1961 年 3 月 17 日的「日本之中國政策」¹⁰、1964 年 1 月 28 日的「國府問題研究課題案」¹¹、同年 2 月的「關於日華關係之若干的想法」¹²等檔案。這些檔案旨在於顯示池田內閣之中國政策方針與「兩個中國」政策的構想。而從佐藤內閣與美國總統的會談內容，¹³ 分析佐藤內閣對中國政策的看法。

除了外交檔案以外也有不少關於中日關係的專文。首先有何思慎的著作『擺盪在兩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¹⁴ 則是由國際關係理論切入解析戰後之東亞局勢與日本對華政策，並從「內部環境」、「外部環境」、「內外部的聯繫」分析日本對中國政策的決策過程。日文專書方面早期有產經新聞所出版的『蔣介石秘錄』（全 15 冊），其中第 14、15 冊的內容與本文有關。在第 14 冊敘述的是二次世界大戰末期和日本戰敗的情形。¹⁵ 第 15 冊主要敘述戰後中華民國至與日本斷

¹⁰ 日本外交檔案，A'-0423 No.37-40，「日本の中国政策」，1961 年 3 月 17 日。

¹¹ 日本外交檔案，A'-0423 No.94-95，「國府問題研究課題案」，1964 年 1 月 28 日。

¹² 日本外交檔案，A'-0423 No.100-105，「日華關係に関する若干の考え方」，1964 年 2 月 13 日。

¹³ 佐藤與美國總統會談內容，可以由以下檔案得知。日本外交檔案，01-535-1，「第 1 回ジョンソン大統領 佐藤総理会談要旨」，1965 年 1 月 12 日。01-534-1，「佐藤総理 ジョンソン大統領会談録」，1967 年 11 月 14 日。01 - 516，「佐藤総理・ニクソン米大統領会談記録」，1970 年 10 月 29 日。

¹⁴ 何思慎，擺盪在兩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台北：東大，1999 年。

¹⁵ サンケイ新聞社編，蔣介石秘録，第 14 冊，東京：サンケイ新聞社，1976 年。

交的過程。¹⁶此書關於當時的中日關係有詳細的說明，因此對本文有很大的貢獻。古川万太郎寫的『日中戰後關係史』。由書名可知此書主要是從歷史敘述戰後之日中關係。而其「日中」的「中」主要係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敘述日本與中共的建交過程。在 1995 年出版的『日本外交與中國¹⁷』是由有留美經驗的國際政治學者添谷芳秀所寫的，1945 至 1972 年的日本對中國外交政策之研究。其目的是首先注意日本非政府角色 (actor)，複合性的考察戰後日本對中外交，同時注意國際政治環境與國內政治的「接點」，提示日本外交分析的一個途徑。而用「對美『協調』路線」、「對美『自主』路線」、「對美『獨立』路線」的交錯，敘述戰後日本外交的構圖。此書說明不少美國等國際政治環境對日本與中國外交的影響，因此對本論文具有參考價值。

關於日本之「兩個中國」政策的探討，有在日之中國學者陳肇斌所寫的『戰後日本的中國政策—1950 年代東亞國際政治的文脈¹⁸』等相關文獻。此書提到「日本政府站在與採取『一個中國』政策的英美不同的立場，採取保持承認國民政府為『台灣的政府』的同時，與『中國』的人民政府建立外交關係為最終目標」。著者並主張日本「兩個中國」政策的一貫性。陳肇斌使用英美兩國的龐大外交檔案分析吉田內閣、鳩山內閣、岸內閣等 1950 年代的日本對中政策。此書第一章是從「吉田 杜勒斯書簡」敘述吉田茂對中國政策之摸索，也是「兩個中國」的萌芽。在第二章所探討的是吉田 鳩山內閣的中國政策的試行。其中相當有趣的是有關「日台聯合國（日台連合國）」的部分。¹⁹ 陳肇斌提到「日台聯合國」的構想是吉田的中國政策之原點。第三章是寫岸內閣的中國政策之展開與挫折。作者認為日本「兩個中國」政策的失敗是在岸內閣時期。因討論「兩個中國」政策的文獻不多，同時本人由於時間、經費之原因無法蒐集日本與台灣以外的外交檔

¹⁶ サンケイ新聞社編，蔣介石秘録，第 15 冊，東京：サンケイ新聞社，1977 年。

¹⁷ 添谷芳秀，日本外交と中國—1945-1972—，東京：慶應義塾大學，1997 年。

¹⁸ 陳肇斌，戰後日本の中國政策 1950 年代東アジア國際政治の文脈，東京：東京大學，2000 年。

¹⁹ 參見本文頁 32。

案，所以此書對本論文有很大的幫助。

此外，在 1961 年時有日本記者寫關於『兩個中國』的書。²⁰ 此書是著者以記者的觀點分析當時的「兩個中國」的看法。其中包括美國與英國的「兩個中國」論，並主張中共與台灣兩國對日本的重要性。此書提到的「繼承國家」方式是另一種「兩個中國」的型態。所謂「繼承國家」方式是把台北政府與北京政府雙方都視為聯合國的原加盟國家「中華民國」的後繼國家，台北政府直接繼承聯合國大會與安全理事會的議席。一方北京政府也分割繼承「中華民國」的大會議席。雖然，此書討論了很多關於「兩個中國」論，但是，此書只寫到 1961 年，因此，缺少本論文所想討論的到 1972 年的部分。

²⁰ 大村立三，二つの中国，東京：弘文堂，1961 年。